

Peter Burke, *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: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*

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2000. vii + 268 pp.

林志宏

新史學第十三卷第三期抽印本  
二〇〇二年九月



Peter Burke, *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: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*

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2000. vii + 268 pp.

林志宏\*

享譽歐美學界的英國文化史家彼得·柏克(Peter Burke)，同時也長期對史學及社會學理論的異同互涉有深入研究。他的新著《知識的社會史》(*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*)，企圖透過歷史題材來處理知識社會學問題，討論歐洲十六至十八世紀間知識的發展。在這本書中，他認為新的知識社會學研究應強調四種取徑：著重知識本身的主體性，注意普羅民眾的知識型構，以「微觀社會學」(microsociology)作更細緻的分析，以及考量不同社會階層差異，尤其性別的因素(頁8-9)。對柏克而言，新的知識社會學就是加入歷史經驗研究的產物。歷史學不必然需要向社會學理論稱臣取靈，它甚至可以提供傳統社會學以新的思考方向。這對歷史學者而言不只有鼓舞作用，也說明歷史學與社會學之間可以互補，並相得益彰。這對近來輕歷史而重理論的學界，特別有啓示意義。

全書共分九章；其論述重點有四。第一，從知識階層(clerisy)概念和建立知識的機構(institution)分析知識的起源，並定義「知識」。二、討論知識的空間分佈與分類問題。三、探討知識與權力，知識與現代國家的建立等等之間的關聯。四、從知識「商品」的出現，描述、討

\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
論出版市場與讀者的關係，以及閱讀習慣的轉變。

本書開頭即道出「知識」和「訊息」(information)的區別。柏克認為訊息雖然實用卻是粗糙的資料；惟有經過系統化之後，訊息始能成為知識（頁 11）。知識——系統化的訊息——究竟源自何時？作者從知識階層的轉變和建立機構來探究。以前者來看，十七世紀歐洲隨著印刷術發明和政府對行政官僚的需求，知識階層的職業於是出現結構性分化：如作家、大學教授、圖書館員、議員等專業工作產生，非但打破既存「文人」(men of letters)的形象，也出現各種職業團體。並且，透過定期刊物來溝通聯繫，這些團體形成自我認同。至於建立機構方面，人文主義者企圖和中古時期大學的「土林哲學家」(scholastic)做一區隔，不願留在大學之內，而另立學院(academy)以資對抗，結果使得大學壟斷高等教育的情況備受挑戰：一方面專業機構與人員出現，另一方面傳授的內容亦和過去殊異。最明顯的例子是「研究」(research)一詞開始具有探索的意涵。不僅如此，知識階層藉由沙龍等地交換資訊，形成輿論和公共領域。他們更專注對經濟、社會和政治的改革。

柏克以城市間交通及長距離網絡，談不同空間內知識如何溝通。這裡他採「中心 / 邊陲」(center / periphery)的觀點討論。<sup>1</sup>以城市為例，它可說是居於「中心」位置，係其他「邊陲」鄉村在職業需求和生產訊息的來源。許多因商業發展起來的港口城市，不僅為經貿地所在，也是不同地域間知識交換的窗口。這種情形直到歐洲航海技術發達與地理大發現後尤為明顯，少數港口更兼具扮演著「微型地理」（指歐洲內地）和「鉅型地理」（指歐洲和其他各洲）知識的轉運、聯繫功能。譬

<sup>1</sup> 關於中心與邊陲問題，可參考 Edward Shils 的討論。見 Edward Shils, *Center and Periphery: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* (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75), pp. 3-16。

如義大利的威尼斯，一直是文藝復興時希臘古典著作的生產地，但同時也編譯和印刷義大利、西班牙、英、法等國語文書籍的功能；又如荷蘭阿姆斯特丹，一樣肩負著俄國、美國，甚至遠自墨西哥、中國、日本等相關非歐語系字典的傳入、翻譯與生產。毫無疑問，印刷術在此扮演突破地理藩籬的功能，開啓歐洲與世界各地文化交流管道。

作者引用涂爾幹(E. Durkheim, 1858-1917)看法，認為人類因時空殊異而知識分類看法不斷改變。大致說來，中世紀歐洲天主教會領導政教，神學為知識體系的主軸；其他學科便形同樹狀分支依附其下。然而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期間，知識最重要的趨勢是在進行重塑。柏克舉培根(Francis Bacon, 1561-1626)在《新工具》(*New Organon*)將心智區分的三種機能——即記憶、理性、想像力為例，說明史學、哲學、詩歌（文學）因分類後被賦予新的特性（頁 99）。同樣在課程(*curricula*)與圖書分類方面，也各自進行轉變。至於博物館與百科全書的分類更饒富意味：如我們所見，博物館非但依產地、時間、材質來區別，同時還製作索引；百科全書則採字母的次序標示。以分類作為形式的百科全書猶如「學習指南」(*map of learning*)，其字母的次序化結果是促成知識的獨立與平等（頁 115）。知識不再由神學來主導，這是知識「去神聖化」的結果。

在知識與權力方面，此時期的國家政治統治者取代教會掌控知識。當然，統治者除以高壓獲取知識發言權外，亦十分重視利用知識來有效管理行政事務。在帝國統治事務日漸龐雜之下，統治者為獲得資訊，開始培養專門提供諮詢的行政官員。這些官員有別於過去的「家臣」，形成國內固定體制。對外統治者如要瞭解外國事務，不得不藉助外交特使。伴隨海外殖民因素，統治者於是積極贊助海外遠征及研究來藉以熟悉並掌握殖民地。對內統治者則經由巡遊或要求各地轄區定期報告，甚至仿效教會對人民施行調查、為防治傳染病而使用的身

份證明及護照等，這些均說明控制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密不可分。作者指出三種知識的發展與建立現代國家有關，分別是：地圖、統計學與檢查制度。重視地圖繪製是因代表國家領土和軍事力所能達及的幅員。而統計學則涉及人口普查與養老金制的發放。檢查制度最初源自喀爾文教派(the Calvinist)的《禁書索引》（頁 141），後來進一步成為國家政策，例如法國路易十四(Louis XIV, 1638-1715)便以畏懼暴亂和擔心機密外洩為由施行檢查制度。

本書另一項課題是關於知識作為「商品」被販售所產生的轉變。首先提出類似今日智慧財產權的興起：如荷屬東印度公司基於海外殖民熱潮與商業考量，結合地理學、航海學知識，編製地圖集以供利用；又如商人注意到出版市場需求，紛紛投入印製百科全書。結果這些都促使著作權受到重視，並獲法律保障。此外，販售知識也帶來其他影響：威尼斯因出版書籍，產生編輯、校對員等新興職業；阿姆斯特丹印刷業開始有以方言來印製書籍，目的是為擴大市場；至於倫敦，則出現「預約款」付費方式。其他如報紙和期刊出現，成為溝通資訊的網絡；還有所謂參考書興起，像出現書評和導覽指南，更因在數量激增下帶動專業化。至於讀者，也在獲得知識的途徑裡自我改變，譬如閱讀採取博覽策略，並以作摘要取代記憶的方式。非惟如此，處理龐雜資訊的方法遠較過去進步，如重視索引、圖表，還有運用百科全書。柏克並舉十六世紀蒙田(Michel Montaigne, 1533-1592)和十八世紀孟德斯鳩(Charles Montesquieu, 1689-1755)強烈對比：蒙田加強記憶功能，並以道德教化為焦點；而相反地孟德斯鳩卻常以觀察事實現象來取代閱讀為策略。這說明兩個世紀之間掌握知識的內容和方法已有明顯差別（頁 192）。

本書之成功處不只在於提供豐富的歷史經驗和素材，豐富了傳統知識社會學。它同時統合大量相關研究成果，以清晰流暢的文筆擷取

他人論點呈現。然而本書訴求對象絕非只是社會史、文化史或出版史的讀者而已。作者還處理到知識的起源、國家權力與知識、知識商品化等問題。透過知識這一概念，作者分析了整個社會的垂直結構——從最高層的國家到下層民眾，以及多樣的社會制度(institutions)的發展。

本書雖掌握知識各種討論面向，不過閱讀時我們也難免有些遺憾。其一，作者強調處理「近代早期」(early modern)的歐洲（頁 12），並將歐洲視為整體來分析。可是，知識的分佈及進程在地理譜系上或許並非平均發展，而是交互錯綜、彼此起伏的局面。例如大學的建立係由地中海北部北傳，而歐洲各地的啓蒙運動進程也不必然一致——西歐明顯早於東歐。雖然本書企圖在傳統知識學裡加入史學研究的關懷，但是它對時間差異的處理仍稍嫌薄弱。

其二，對知識性質與經驗傳承，作者只從書籍或出版品來討論，無法含括知識本身的多樣性。如本書所言，柏克將不探討宗教及巫術所代表的「超自然」知識領域（頁 12），可是其實有些知識的性質卻又絕非以現代學術專業分科能夠界定。譬如師徒制中呈現的獨門密技，抑或家傳絕學，這些無法言明的知識(tacit knowledge)和技藝，<sup>2</sup>環顧古今歷史依然存在。如何解釋這些知識的性質及傳承，並放置歷史現象中探討，作者顯未關注。這有待未來研究者繼續努力。

最後，筆者認為本書的若干論點，可供近代中國知識史研究討論的參考。首先是經學「去神聖化」的問題。經學的崩解誠為近代中國學術變遷大事，其中固有來自西力衝擊造成影響，同時又和清季各項制度變革密切相關。本書描述對神學失去主導地位後所形成的知識獨立精神，似乎可供參考。其次為圖書分類討論。經、史、子、集向來

---

<sup>2</sup> Michael Polanyi, *Personal Knowledge: Toward a Post-critical Philosophy* (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58), pp. 53-55.

是中國圖書分類的主要原則，從東晉李充《四部書目》開始，一直到民初藏書家們為止，其間看法雖略有增刪，但基本上並無太大的改變。然而遲至晚清民初時期，西方新傳入的學科內容，使得原先四部分類法不足概括，結果非但援引西方的分類方式，也導致對傳統知識的分類產生看法上歧異。民初《四庫全書》的影印，乃至續修都曾出現過類似相關的爭論。柏克在書中對圖書分類造成知識獨立和平等性，以及知識背後所呈現的世界觀等討論，很可以做為我們觀察近代中國知識發展的借鏡。

再者，知識和國家權力關係，一直為中國歷史研究裡亟待開發的部分。儘管清朝官方編纂《四庫全書》與知識傳達研究已有相當成功的著作，<sup>3</sup>可是對瞭解知識本身內容呈現的多元面貌，其實還有其他時空下的課題等待我們挖掘。就以西學傳入後的民國圖書分類來說，由於政治力的介入，而有所謂「國父思想」和「革命書籍」的分類，即是其例。

總括言之，近百年來中國人對知識的看法，隨著世界局勢的衝擊，有著快速地變遷。學界目前已注意到中國地理學知識的轉變問題。<sup>4</sup>而柏克這類知識史的著作，相信可以提供一些概念，激發我們去探索中國知識社會史的天地。

<sup>3</sup>R. Kent Guy, *The Emperor's Four Treasuries: Scholar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'ien-lung Era* (Cambridge and London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87).

<sup>4</sup>例如，Tang Xiaofeng, *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: a Change in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Geographical Past of China* (Beijing: The Commercial Press International, Ltd., 1999)；郭雙林，《西湖激盪下的晚清地理學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；鄒振環，《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）；Carolyn Cartier, "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a Geographical Idea: the Macroregion in China," *Modern China* 28.1 (2002/01): 79-97。



